

左翼知識人與中國革命

——評夏濟安《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

● 唐小兵



夏濟安著，萬芷君等譯：《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

天地玄黃的1949年11月16日，左翼作家胡風在寫給妻子梅志的一封信中黯然說道：「我們多麼可憐，獻出心去還要人家要不要！」^①這似乎成了左翼知識份子在二十世

紀中國的歷史命運的一個隱喻與預言。不同於自由派知識份子、新儒家知識份子在價值觀和政治立場上與中共存在明顯的分歧，左翼知識份子一直是革命的同路人甚至並肩作戰者，他們理所當然地認定自己是革命勝利的「有功之臣」，但卻未曾預料這種政治意識上的「主體性」，恰恰是新政權猜忌和防範的根源之一。相對於學術界對自由主義、新儒家等知識份子的研究，對左翼知識份子的研究一直處於「虛假繁榮」的狀態，也就是說雖然有很多成果，但絕大部分都是停留在作品或者文本分析的層次，甚至滯留在意識形態再闡釋的境地，而未能將現代中國左翼文化運動還原到歷史語境，從歷史與思想互動的層次來探測人性在二十世紀革命政治中間的脈動與掙扎。

就此而言，夏濟安遠在五十年前（1968）以英文出版、最近譯成中文的《黑暗的閘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以下簡稱《黑暗的閘門》，引用只註頁碼），至今

二十世紀中國左翼文學和左翼作家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但大多數是對左翼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而缺乏一種更為宏闊的歷史視野，也不能很好地將左翼文化人放置在歷史的脈絡裏來展開具體的分析。

《黑暗的閘門》對左翼文學的優劣之洞察、對人性在歷史與政治困境中的掙扎之深度理解，以及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內在悲劇感的通透把握，都使此書在史料相當受局限的1960年代超越了時代的限制，而成為具經典性的作品。

仍舊是中國左翼研究無法超越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同為研究左翼知識份子與左翼文學的學者王宏志（亦為此書翻譯本的推動者）在序言中精闢地概括了全書的主旨：

《黑暗的閘門》共收七篇文章。表面看來，這是一本輯錄幾篇相關文章而編成的論文集，不是一本研究專著，而魯迅（1881-1936）、瞿秋白（1899-1935）、蔣光慈（1901-1931）三篇是個別文學作家的研究，左聯〔左翼作家聯盟〕五烈士、左聯解散以及延安文藝座談會各篇則是政治成分較重，針對的是團體或群體，二者好像不甚協調。但其實不然，無論是有關魯迅、瞿秋白和蔣光慈個別作家的討論，還是針對五烈士、左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十餘年的文壇，夏濟安在探討的是同一個命題：如何理解政治與文學千絲萬縷的複雜關係？（頁 viii）

二十世紀中國左翼文學和左翼作家的研究可謂汗牛充棟，浩如煙海，但大多數基本上是對左翼作家作品的文本分析，而缺乏一種更為宏闊的歷史視野，也不能很好地將左翼文化人放置在歷史的脈絡裏來展開具體的分析，因此，這些作品的影響往往局限於文學界而無法溢出學科之窠臼。雖然在夏濟安之後，有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王宏志《魯迅與左聯》，以及更年輕一代學者程凱、姜濤等的專著^②，都基本上超越了此前被主流政治意識形態所宰制的對左翼文學與文化人的研究境況，但相比較而言，《黑暗的閘門》對左翼文學的優劣之洞

察、對人性在歷史與政治困境中的掙扎之深度理解，以及對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內在悲劇感的通透把握，都使此書在史料相當受局限的1960年代超越了時代的限制，而成為一部具有經典性的作品。

一 左翼知識人的「血路」與心路

夏濟安畢業於上海光華大學英文系，後成為西南聯合大學、台灣大學等校英文系教授，培養了諸如白先勇、陳若曦等著名作家，1959年赴美後因緣際會進入中共黨史研究，《黑暗的閘門》就是他涉足這一領域的成果。夏濟安在去世的前一年，即1964年6月寫了一篇〈一部關於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的書稿序言〉，交代研究現代中國的左翼文學與左翼知識份子是因為對既有的主流歷史敘述不滿，認為這種意識形態的歷史敘述裁剪了豐富的歷史事實，而忽略了左翼文學運動內部以及左翼文學與政治關係的複雜性。夏濟安關注的是這一群左翼知識人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心路歷程」：

這些作家發現在「五四運動」以後面臨巨大的自由和巨大的責任。巨大的自由是因為舊中國的社會體系瓦解了，巨大的責任則是因為他們有大好機會去創造理想的未來。對於當時的狀況，他們當然是不滿意的。1911年以來，革命思想讓不少知識份子着迷，1917年俄國樹立的榜樣堪為革命的理想範式。很多人自願擁護共產主義，他們找到了配得上自己的事業，他們願意為此

奉獻自己的才華——必要時甚至奉獻生命。但是，起初的自覺獻身最終淪陷於共產黨的運作體制。每個人都要服從命令，遵守紀律。個人對於改變現狀的意願、對於自由的聲張以及挑釁和反抗的姿態，在集體意志和統一行動中消於無形。（頁 xxx）

夏濟安在《黑暗的閘門》中選擇瞿秋白、蔣光慈、魯迅和左聯五烈士等來探索現代中國的左翼文化運動，基本上就是圍繞上述的核心問題意識展開的。

最早投身左翼文化運動的知識人，基本上都是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感召而從各地蓬然而起的，新文化運動所訴諸的民主、科學、自由、戀愛神聖、人生自主等觀念，讓他們在苦悶的日常生活世界裏抓取到了否定和反抗既有價值體系的「批判的武器」，同時也讓他們有了想像自我與未來中國的思想資源。因此可以說，左翼知識人追求的個人解放和生活自由，都是建立在將傳統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污名化為「牢籠」或者「網羅」的基礎之上的。正是從個人主義、個性主義出發一路奔向人本主義，才有了國民性改造的文學母題，中國社會因此被闡釋成了一個懸而未決的「社會問題」，也因此才有傅斯年倡導「造社會」的壯懷激烈，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各種社會問題叢書如過江之鯽在知識界湧現，也是時代症候的一種彰顯^③。

簡言之，五四之子所追尋的並非經典意義上的構築在權利、秩序與自律基礎上的自由，他們毋寧是一種從傳統共同體裏奔湧而出尋求

解放的浪漫主義的「個人」——解放並不同於自由，而傳統也絕非一定是倫理的負擔。當「舊中國的社會體系」在新文化的衝擊之下土崩瓦解之後，知識人發現失去了傳統的庇護，而新的共同體尚未建立起來之際，作為「歷史中間物」（魯迅語）的個人被纏結在含混、突兀而撕裂的歷史節點之中，前不着村，後不着店，形同十字街頭上的幽靈。無論是魯迅的「發現自己絕非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④，還是郭沫若的「天狗論」，都在展現一種過渡時代的人性落寞與自我膨脹。

正是這一群最有個性、最愛浪漫的讀書人，在經歷了最初的自由奔放與隨之而來的人生煩悶之後，突然發現失去了「昨日世界」之後的自我空空蕩蕩、一無所有，於是重新開始尋找組織，尋覓理想，試圖將自我的生命意義安頓在一個巨大的烏托邦理想之中，並扎根在其現實的組織體制之中。為了理想而毀滅歷史與傳統，為了意義而投身左翼與革命，在這個裹着血與淚的歷史過程中左支右絀、進退失據的個人，才是夏濟安特別關注的「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

夏濟安依託於有限的史料和驚人的直覺，卻能洞幽燭微，曲徑通幽，洞察出這一批左翼知識人內在的困境。這個困境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文學理念上的高調與文學創作上的挫敗的反差。用夏濟安的話來說，就是「成為更好的共產主義者怎麼就意味着能夠成為更好的作家呢？」（頁 63）；二是個性化的自我與高度紀律化的組織之間的張力。前者以左翼的革命理論概念先行地「製作」文學，革命理論綁架了

夏濟安依託於有限的史料和驚人的直覺，卻能洞察出左翼知識人內在的困境：一是文學理念上的高調與文學創作上的挫敗的反差；二是個性化的自我與高度紀律化的組織之間的張力。

夏濟安並不認為蔣光慈的失敗是一種政治介入文學的普遍意義上的失敗。他認為蔣骨子裏軟弱而自戀，才是構成其作品中的高亢主人翁與其憋屈自我之間強烈撕裂的心靈根源。

文學者的靈感，也壓抑了原創性與現實感，最後所造就的是公式化、普遍化的淪為革命符號的「個人」；而後者造成的更是「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兒女」這一巨大的歷史悲劇，這在前引胡風的書信中可管窺一斑。

二 蔣光慈：天才與瘋子之間

在第二章有關蔣光慈的討論中，夏濟安在分析很早就投身中共革命而後被開除出黨的左翼作家蔣光慈時，即敏銳地注意到了上述的糾結。蔣出身於安徽一個小資產階級家庭，同瞿秋白一樣，也是因為在早期左翼青年中具備俄文閱讀和翻譯的基礎，而致力於馬列主義的介紹與宣傳，主要工作是任教於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但也勤奮於文學創作。他所創作的《麗莎的哀怨》（1929）、《衝出雲圍的月亮》（1930）和《咆哮了的土地》（1930）等被認為是革命文學的重要作品。但在夏濟安看來，這些作品無論就藝術成就還是其所展現的歷史文化與思想的深刻性而言，都是一些不太成功的嘗試。夏濟安指出：

蔣光慈是一個資質平庸的作家，除了自命不凡和激情洋溢之外平凡無奇，而這些特質在他那一代的年輕人中幾乎比比皆是。「五四」運動促生出大量的反叛青年，他們用自我來對抗社會，後來發現個人的力量在對抗中顯得太過單薄，於是頌揚社會中的一個階級，即被神化了的無產階級，他們認為這個階級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頁65）

可以說，對階級的闡釋以及由此而凝定的階級立場，就成為左翼知識份子診斷當時中國社會所抱持的一種激進姿態，階級鬥爭在左翼文學的系譜中也就成為了萬靈丹藥。

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這些投身左翼文化事業的中小知識青年，極少是真正出身於「無產階級」（無論是工人階層還是農民階層），反而大多出身於沒落的士紳家庭或小資產階級階層。出身與立場之間、政治抉擇與意識形態之間、文學者（理念人）與革命者（行動者）之間，構成了左翼知識人一種持久且內耗的尖銳對立。有些左翼知識份子對這些痛苦視而不見、假裝和諧，有些寄希望於革命政黨的「總體解決」，而那些「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就在對這種痛苦的逼視中靈魂戰慄。

儘管如此，夏濟安並不認為蔣光慈的失敗是一種政治介入文學的普遍意義上的失敗，在他看來，蔣的革命文學並非「奉旨文學」的案列，而更多折射出的是蔣個性上的偏執與人性上的軟弱對其創作與思考造成的巨大限制，所以他在論述的時候又將蔣與其他更極端和意識形態化的左翼作家區分了開來：

蔣光慈是第一個投身詩歌和小說創作的中國共產黨。但是，他的「公式」反映出他作為個體所在意的事物，所以不是他按照意識形態憑空發明出來的。儘管這一個體執迷不悟、能力欠缺，顯得愚蠢、淺薄而迷茫，我們在此不應在意，他是否有別於那些在寫作上完全聽命於共產黨且個性喪失得更為徹底的宣傳家。誠然蔣光慈也曾試圖取悅黨，但最終反而惹怒了黨。如果他混淆

了政治問題與愛情趣味，那就不會引導讀者走向堅定不移的革命之路。(頁77)

夏濟安認為蔣光慈骨子裏軟弱而自戀，認定這兩者才是構成其作品中的高亢主人翁與其憋屈自我之間強烈撕裂的心靈根源：

一個真正的天才或是一個瘋子應該是不在意自己的名聲的。跟這兩個都沾不到邊的蔣光慈倒是很注重自己的名譽。強烈的自尊心不容許他坦誠自己的軟弱，自己被壓抑的對家、溫暖和摯愛的欲望。這種欲望與共產主義者的身份極不相稱，但正是這種欲望塑造了他小說中的情節，可以說是一個落寞者的白日夢。(頁83)

三 革命文學的可能/不可能性

在第五章對於左聯五烈士(胡也頻、柔石、馮鏗、殷夫和李偉森)的革命人生與文學創作之關係的分析中，夏濟安同樣聚焦的是這群人「天真的人生觀以及對文學粗疏的理解」(頁145)。簡言之，就是他們在革命激情的驅動之下，最大程度地簡化了人性的複雜性，用黑白分明的兩分法來認知歷史與人心。革命文學中的吶喊與激烈，為在飛行集會、扔炸彈、撒傳單等激進主義的政治行動中不斷遭遇挫敗的革命者，提供了一種象徵性的心靈安慰與虛假的革命高潮體驗。革命邏輯與文學審美之間的對峙恰恰反證了革命文學的不可能性，夏濟安的這一段論析切中肯綮：

如果成熟意味着一名作家可以從多個角度看待事物，能夠讓經驗和理想獲得平衡，即使在最高尚的行為中也洞見人性的弱點，那麼，胡也頻的確算不上成熟。但丁玲也沒比他好到哪裏去。革命作家面臨的最大阻礙正是他們對革命的熱情。他們如此堅信革命即為至善，所以從未質疑過它。他們的動機往往十分純潔，沒有分析的必要，而且在罷工、示威或暴亂等狂熱時刻，理智似乎顯得格格不入。(頁160)

這就觸及到二十世紀中國共產革命最核心的主題：「新人」的塑造或者道德革命的可能性^⑥。在革命文學者看來，人心只有兩種：天使的至善或魔鬼的卑劣，前者是革命者的專利，後者是反革命者的標籤。換言之，革命文學乃至革命本身從來不承認在黑與白之間灰色調的存在，正是這種高昂而粗暴的無視人性的幽暗，導致了革命者與革命文學雙重的虧空。人對自我心靈的探尋程度，決定了他對其創作的人物之心靈複雜性的理解程度與表達能力，在這方面，茅盾文學作品的歷史感更強烈，而不是簡單的革命文學的公式和教條，顯然要比這些年輕的左翼作家做得好一點。

由此可見，夏濟安對革命與文學的理解，遠在革命文學者之上：

如果一名作家沒能注意到這些，那他不會知道在何種境遇下，人性會既崇高又低劣——閃耀着真正的英雄主義光輝的同時，卻也可能被無恥地操縱和愚弄。畢竟，革命要靠人的努力，而不是靠天使的饋贈。在革命進程中浮現的恐懼、虛

在對於左聯五烈士的革命人生與文學創作之關係的分析中，夏濟安聚焦的是這群人「天真的人生觀以及對文學粗疏的理解」。革命邏輯與文學審美之間的對峙恰恰反證了革命文學的不可能性。

偽和荒謬，與當初誘發革命的理想一樣，都是人性的一部分。如果革命中出現的問題使人沮喪和惱怒，那麼人們仍能從革命理想中尋求愉悅和慰藉。(頁162)

或許，正是這一複雜而具有「同情的理解」的態度，讓夏濟安的這一部出版於1960年代冷戰背景下的作品，並非簡單的反共式文學評論，或者「告別革命」式的歷史書寫，而是一部充滿溫情與洞見且多有持平之論的佳作。

四 魯迅：革命政治與左翼文化之間

魯迅作為左翼作家的精神領袖，之所以能超越這群作家在創作上的「刻板模式」，就因為其對人性中的複雜與曖昧有着驚人的洞察力，也正因为內心深處「人與鬼的糾纏」，倡導「掙物質而張靈明、任個人而排眾數」的魯迅才會活得「怨憤深廣」^⑥。夏濟安在第三、四章中將魯迅與其同時代的知識人歸置在一起進行比較，所得出的結論到今天仍發人深省：

胡適的樂觀與周作人的悲觀都能在魯迅身上找到呼應。魯迅與他們一樣不滿現狀，但不同的是，他的所見所想比他們更廣。在激進派和胡適一樣的溫和派看來，未來一片光明，但在魯迅的細察之下，未來卻難掩其黑暗的一面。另一邊，周作人、林語堂等人試圖尋回一個可愛安寧的傳統中國，然而，儘管舊中國的醜陋也有迷人之處，但在魯迅眼裏卻始終面目可憎。魯迅所面臨

的問題遠比同代人更複雜、更壓抑，他也因此更能代表那個時代的問題、矛盾與不安。把魯迅歸為某種運動、扣上某種角色或是劃在某個方向裏，其實都是在吹捧歷史抽象化的同時，淹沒了他個人的天才。就算魯迅的時代只是一個過渡期，可它的性質到底是甚麼？光與暗一類的對比恐怕永遠也道不全那個時代的真意，因為光暗之間還有無數深淺的灰。好比暮色裏藏匿着鬼影、私語、異象與幻影，稍不注意，它們便消逝在等待黎明的焦躁中。魯迅便是這暮色裏的記錄者，他以敏銳的洞察力和微妙深刻的感情寫作，而這些品質正是他作為反叛者發聲時所缺失的。(頁141)

在夏濟安看來，具有如此豐富的內心世界的魯迅，一旦捲入革命政治與左翼文化之爭，仍舊難免被簡單化和極端化的革命思維和心靈所滲透，複雜幽微的心靈被信仰的教條窄化。魯迅在私人書信裏所謂的「橫站」，恰恰說明了其躋身的這個左翼圈子的封閉與險惡。作者感慨：「左翼作家們雖貴為上海大都市的知識份子，但他們的懦弱、狹隘、自負絲毫不亞於魯迅老家紹興的農民、鄉紳。」(頁116)而這種腹背受敵的痛苦感，更是強化了堅持「一個也不寬恕」的立場的魯迅在精神上的執拗甚至偏執，他生命晚期創作的雜文正是這種鬥爭性的「歷史遺產」。正如蔣光慈不願意去十字街頭參加激烈的革命行動因而與組織發生尖銳衝突一樣，早年受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等哲人影響而深具獨立之精神人格的魯迅，自詡為「精神界戰士」，也不願意放

具有豐富的內心世界的魯迅，一旦捲入革命政治與左翼文化之爭，仍舊難免被簡單化和極端化的革命思維和心靈所滲透。魯迅在私人書信裏所謂的「橫站」，恰恰說明了其躋身的這個左翼圈子的封閉與險惡。

下身段丟棄思想成為革命列車上的提線木偶，因而與左聯掌握實權的周揚等人之間發生劇烈的對抗。

魯迅晚年最深刻的悲劇就是作為五四新文化的啟蒙者，其所篤信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與組織所要求的對共產主義及其肉身（黨的負責人）毫無保留的信仰之間的深刻矛盾，這其實也是夏濟安在書中討論的瞿秋白、蔣光慈等人所面對的共同精神困境。正是從這樣一個脈絡出發，夏濟安對以魯迅為代表的這一群左翼知識人「未盡的才情」深感惋惜：「藝術家在革命中扮演甚麼角色？個人與組織之間存在怎樣的內在矛盾，又如何相互依存？」（頁107）

五 瞿秋白：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

同樣具有強烈悲劇意味的是，夏濟安在書中第一章討論的中共早期領袖瞿秋白，作為一個骨子裏浪漫多情的中國文人，卻躋身高位成為共產黨最高領導人，面對日益嚴苛的革命環境與極度嚴密化的組織紀律，天性憂鬱、性格優柔的瞿秋白所感受到的是，其在離世之前的心靈史經典《多餘的話》（1935）中所坦承的「二元人物」的分裂，即作為戰士的黨員與作為讀書人的文人之間的分裂。可信者不可愛，可愛者不可信，理智奔向未來，而情感牽絆在過去，這樣的人生怎能不是一種自我的折磨？

夏濟安對瞿秋白的知人論世之語無出其右者：「他是一位搞革命的抑鬱症患者；一個有社會主義覺

悟的唯美主義者；一個憎惡舊社會的多愁善感者；一個在莫斯科受過訓練的『菩薩行』人生觀的實踐者；一位追尋『餓鄉』卻又受不了黑麪包的朝聖者；或者，一言以蔽之，他是一位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頁40-41）所謂「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是跟鐵石心腸的、如霜雪般冰冷且極具行動能力和冷酷意志的革命者相對應：前者是誤入革命之路的觀念人，後者則是目標明確的行動者；前者拖着浪漫主義的個性與才情，後者已被鍛造成職業革命家的整齊劃一。

瞿秋白曾經試圖通過革命和入黨來克服身上的雙重人格的衝突：

他的這兩種人格都需要專一的忠誠，但是對之投入相同的精力是不可能的。一種衝動是要追隨自己天性，滿足自己對溫和、柔情、美麗的物件和舒適的氛圍的渴望。而另一種衝動則是追隨理性，做理智認為正確的事情，毫不遲疑地從整體上來接受革命，接受革命所伴隨的嚴酷、醜惡和變態。如果不能作出妥協，那麼他必定要作出選擇。（頁30-31）

通過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和依託於黨組織，瞿秋白表面上似乎超越了這種兩難選擇。但其遺作《多餘的話》充分地證明，這種人性與黨性之間的纏結從來就沒有得到一個妥帖的安置與紓解，他對政治的厭惡是如此根深蒂固，政治代表了世間一切的醜惡：精力的耗竭、致命的疲乏、心靈的死亡、感官的麻木、永恆的謊言，以及自然情感的毀滅。

夏濟安認為《多餘的話》作為一個虛度了一生的人的輓歌，作為

魯迅晚年最深刻的悲劇就是作為五四新文化的啟蒙者，其所篤信的「自由之思想、獨立之精神」，與組織所要求的對共產主義及其肉身（黨的負責人）毫無保留的信仰之間的深刻矛盾。

夏濟安認為瞿秋白是一位軟心腸的共產主義者。瞿秋白遺作《多餘的話》充分證明，人性與黨性之間的纏結從來就沒有得到一個妥帖的安置與紓解。這部作品超越了政治，超越了階級鬥爭，超越了任何的意識形態。

一個軟弱且疲倦的自我的悲哀陳詞，這部作品超越了政治，超越了階級鬥爭，超越了任何的意識形態。因此，那個本真的、憂鬱的瞿秋白通過臨終遺言的方式俘獲了讀史者的心靈：「無論是作為共產黨的書記、理論家、左翼作家中的領軍人物，或是國民黨的階下囚，他依舊還是那位年輕的秋白，對莫斯科那被雲影遮住的月亮，慨嘆不已；對那神秘而可怕的俄雪，發出絕望的哀嚎。」（頁41）

六 左翼知識份子：難以歸類的歷史存在？

從上可見，夏濟安的《黑暗的閨門》又何嘗不是獻給二十世紀中國上半葉左翼知識人的一曲輓歌？尤其是本書第六章關於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討論，充滿了一種哀婉的情調與歷史的反諷，那些在上海的亭子間裏高歌自由與解放的作家，當他們憧憬的革命政治理想化成延安文藝座談會確立的一條條文藝創作與批評的清規戒律甚至天羅地網之後，這些曾經一度浪漫多情甚至自戀自負的知識人，在日益逼仄和窄化的政治文化空間裏，也就只能俯首稱臣，唾面自乾，或者掙扎着試圖保留一點點最後的創作自由與作為一個讀書人的尊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更何況知識份子與政黨間「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關係比喻已成為經典說法，都貼切地表明在這場無產階級意識形態為主導的革命中，作為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注定無處可逃的歷史命運，知識份子的原罪意識即由此滋生。

夏濟安對這群左翼作家的困境不是站在一個大洋彼岸自由的高地冷嘲熱諷，而是設身處地理解他們的苦悶而給予了深切的同情：

自1942年來，毫不相干的世界觀，往往被強加在共產主義文學作品中，顯得格外突兀。合理的解決辦法似乎有二，一是借鑒自由主義，允許作家不遵照任何政治準則，以個人的才能發展自己的創作方法，二是完全按照公式寫作，直接宣告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徹底勝利。然而，毛澤東卻提出雙重標準，給作家們徒增混亂和痛苦。毫無疑問，藝術家的世界觀與他的創作方法之間有千萬種可能的關聯，但在中共的政治形勢下，關聯只有一種，那就是恐懼。中共中國的作家要時時想到自己對黨的責任，難免提心吊膽，但同時，他們又跟其他作家一樣，要在思想、情感、意象、文字的漩渦中掙扎。（頁232）

左翼作家高歌革命的浪漫，卻闖入禁欲的領地，他們詛咒傳統的罪惡，卻陷溺在新組織的鐵籠之中；他們追求個性的解放，最終卻發現這種自由奔放的個性與政黨的鐵的紀律格格不入，而沒有了傳統多元共同體和價值資源對心智生命的滋養，個人在面對異化的革命時更是喪失了抵抗的可能；他們誤入了革命政治的場域，卻仍舊試圖保持着一點知識人的斯文與尊嚴。論革命，不及職業革命家的果決與毅力；論文學，不及沈從文、周作人等京派文化人的博大與璀璨。最後這群左翼知識人似乎成了不倫不類、難以歸類的歷史存在，也恰恰

是這種難以歸類的遲疑、軟弱、孤獨與憤激，映照出了革命年代的面相與症候。這正如錢理群在研究胡風、舒蕪等左翼知識人建國後的人生悲劇時所反思的那樣⑦：

左翼知識份子所表現出的信仰的堅定，鬥爭的勇氣，行動實踐的意志與能力，義無反顧地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都是令人崇敬的。但他們卻很容易將自己的信念、信仰絕對化，把千辛萬苦作出的選擇視為通向真理的唯一道路，而把所有不同於自己的選擇，理所當然地看作是錯誤，以至反動，從而從根本上拒絕多元化的觀念。他們更容易把鬥爭絕對化，理想化，甚至審美化；而殘酷的鬥爭環境也使他們容易產生二元對立的思維，相對缺少寬容的心態，甚至視之為必須拋棄的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而他們的實踐性品格，又使他們很容易產生對組織的力量，特別是共產黨這樣的思想、意志與行動高度一致的組織的信賴，依從，因為這是革命實踐所必須，在思想上也就有將組織真理化的要求。所有這些，都是左翼知識份子比較容易（當然不是必然）陷入黨迷信，陷入獨斷論的內在原因。這樣，他們就不免要陷入走向自己理想、追求的反面的歷史悲劇。作為後人，面對這樣的悲劇結局，要作出客觀的歷史評價，常常陷入兩難境地：一方面，我們不能因為左翼知識份子追求的崇高，不去正視他們確實存在的失誤，甚至是迷誤；另一方面，我們又不能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時，將他們原初的，也是內在的精神品格輕易否

定與拋棄。特別是在人們失去信仰，許多知識份子都放棄了對真理的追求的當下中國，左翼知識份子的這些精神品格就顯得格外可貴，但我們又不能因此而忘掉他們曾經有過的迷誤所付出的血的代價。

註釋

① 錢理群：〈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胡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份子的歷史命運（上）〉，載《1949-1976：歲月滄桑》（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17），頁348。

② 參見李歐梵著，王宏志等譯：《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英文原著於1973年出版；王宏志：《魯迅與左聯》（台北：風雲時代出版公司，1991）；程凱：《革命的張力：「大革命」前後新文學知識份子的歷史處境與思想探求（1924-1930）》（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姜濤：《公寓裏的塔：1920年代中國的文學與青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③ 唐小兵：〈型塑社會想像的思想資源與概念工具——以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問題」系列圖書為中心的考察〉，《中共黨史研究》，2016年第5期，頁9-22。

④ 魯迅：〈《吶喊》自序〉，載《魯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頁417-18。

⑤ 唐小兵：〈重訪中國革命：以德性為視角〉，《思想》，第28期（2015年5月），頁275-300。

⑥ 魯迅：〈文化偏至論〉，載《魯迅全集》，第一卷，頁46。

⑦ 錢理群：〈1954-1980——從開端到結局：胡風事件背後的左翼知識份子的歷史命運（下）〉，載《1949-1976：歲月滄桑》，頁434。

左翼作家追求個性的解放，最終卻發現這種自由奔放的個性與政黨的鐵的紀律格格不入。左翼知識人似乎成了不倫不類、難以歸類的歷史存在。這種難以歸類的遲疑、軟弱、孤獨與憤激，映照出了革命年代的面相與症候。

唐小兵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副教授